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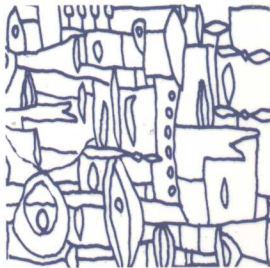
社会理论

第3辑

SOCIAL THEORY No.3

主 编/苏国勋

副主编/渠敬东 张旅平



本辑论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基本概念、理论演进与价值 王 军
- 塔尔科特·帕森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赵立玮
-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肖 瑛
- 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概念 (美) 埃立克·奥林·赖特
- 社会科学方法论脉络中的诠释学进路 徐 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脱胎于《国外社会学》的《社会理论》放眼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将所有符合以“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的文化产物”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纳入视域；在继续评介国外各种社会学理论、深入了解世界社会理论最新潮流的同时，更侧重刊登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以国外社会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扎根于中国本土经验、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文章，以鼓励和催生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关注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理论努力，竭力推动中国社会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成熟。

www.ssa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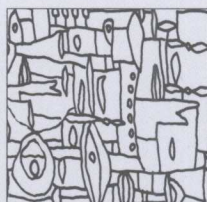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230-580-9/D · 153

定价：35.00元

社会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SOCIAL THEORY *No.3*

第3辑

主 编/苏国勋 副主编/渠敬东 张旅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理论 (第3辑) / 苏国勋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230-580-9

I. 社... II. 苏...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683 号

社会理论 (第3辑)

主 编 / 苏国勋

副 主 编 / 渠敬东 张旅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汪建根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18.25

字 数 / 306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30-580-9/D · 153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中心论题

-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 1
- 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基本概念、理论演进与价值 王 军 / 21
- 苏联及其后继国的民族地位和民族问题：
 一项制度主义的解释 [美] 罗杰斯·布鲁贝克著 王建光译 / 47
 比较 - 历史社会学中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困境
 [韩] 辛钟和著 张虎彪译 / 80

社会学论坛

- 塔尔科特·帕森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赵立玮 / 96
-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反身性”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之建构 肖 瑛 / 120
- 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德] 安德烈亚斯·齐曼著 张睿译 / 156

古典钩沉

- 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概念
 [美] 埃立克·奥林·赖特著 刘能译 / 177
- 论涂尔干的道德个人主义 吴建平 / 201

方法论辨

社会科学方法论脉络中的诠释学进路 徐 冰 / 229

书评与随笔

社会文化体系转换与危机社会学

——皮季里姆·A. 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社会与文化的

视角》简评 何 健 / 264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CSR） 丁太丽 / 273

编辑絮语 / 287

《社会理论》稿约 / 289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

一 “东方现代化”问题的提出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问题，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在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曾被看做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来划分为近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中东（波斯湾到东南亚）、远东（太平洋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而这个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

业革命和现代民主潮流洗礼。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

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也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东方”和“西方”成为政治概念，“东方”被西方冷战理论赋予了非民主的集权含义。魏特夫（K. A. Wittfogel）认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的农业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赖于协作的灌溉系统，而这种协作进而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形成政治权力控制的庞大社会组织网，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根源（魏特夫，1957/1989）。

后殖民主义的解构话语中，“东方”则成了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萨义德（E. W. Said）用秉承福柯通过知识关系揭示权力关系的方法，在1978年发表了《东方学》一书。该书分析了几百年来西方的学者是如何认知、想象及建构“东方”的，并提出一套学说来挑战西方学界关于“东方”的霸权话语，反对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一套与东方学相对立的“西方学”，引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浪潮（萨义德，1999）。

苏东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F. Fukuyama）借用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终结的论断，从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个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或俄罗斯东

正教文明的对立 (Huntington, 1996)。有趣的是,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 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 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新美国和老欧洲 (托德, 2002; Kagan, 2003)。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 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东方现代化”可能性的命题。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 东亚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IEs)”, 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功地实现从边缘向半边缘的跨越。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随之出现了, 一些“新儒家”学者, 根据东亚现代化的经验, 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归因命题提出挑战, 试图建立儒家文化与东亚发展的内源发展理论。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入手, 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中也存在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 这是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余英时, 1987)。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则直率地指出, 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 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 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 (金耀基, 1993)。世界银行的专家们, 似乎也从东亚的发展中看到新的前景, 发表了《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 用“惊心动魄”的美誉赞扬东亚的发展 (World Bank, 1993)。

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奇迹”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戴约 (F. C. Deyo) 以泰国为例指出, 东亚国家的经济存在“三明治陷阱”, 上面是发达国家抢先占领并用一切手段维持的高附加值产品市场, 而下面是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 所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很困难 (Deyo, 1995, 2000)。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则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直接宣称, 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 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 (Krugman, 1994)。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风暴, 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 物价大涨, 甚至社会和政局动荡, 使“东亚奇迹”的话语陷入“失语”状态, 对“东亚现代化”是否可能的疑虑重新开始在学术界弥漫。

然而, 东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的迅速恢复增长, 使人们对“东亚模式”重新产生兴趣, 不过各种解读也是毁誉参半。至于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 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说: 一是“自由市场经济”解说, 即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模仿了西方体制, 采取了彻底的自由经济政策, 因此可以调动

全世界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World Bank, 1993); 二是“政府干预”解说, 认为东亚的政府有意识干预市场, 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 (Amsden, 1989; Wade, 1990, 2000); 三是“外向型经济”解说, 认为国际贸易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 东亚实行的外向型发展政策, 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动力 (Krueger, 1992)。而对于“东亚模式”的批评, 则多数集中在“政府过度干预”、“民主化缺失”、“权贵经济”、“裙带关系”等等。

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 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规模的有限, 以及发展过程处于冷战的总体背景, 所以“东亚经验”实际上还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一部分和实验场, 或者作为其延伸、扩展和推进。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近 3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使世界再次关注“东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快速发展, 再次提出了“东方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 中国等大国的情况很不同, 中国现在的人口, 已经比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等大国的兴起, 不仅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 而且会形成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所以说, “东方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 它应当包括所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新经验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验”可以说是这种新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它应当有这样几个规定性: 第一, 所谓“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 它不是仅仅指“成就”, 它也包括“教训”, 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 第二, “中国经验”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 一些对深化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探索意义的东西; 第三, “中国经验”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 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 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 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 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二 影响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运行的四种力量

中国的改革发展, 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变化。但可能很多人认为, 特别是国外的学者认为, 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其实在

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是一个混合的整体，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不可能把一个领域从这个整体中单独分离开来。而每一个领域都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如经济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竞争的效率和经济的收益，政治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和实现民意表达的社会理想，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的整合、团结、和谐和公正，文化追求的最高价值是“传统”的更新延续和凝聚力、感召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要使这些不同的价值有沟通的桥梁，有相互协调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一个领域的逻辑去替代所有领域的发展规则。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四种力量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市场配置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的取向，中间虽然也经过了反反复复，但体制转轨的步伐基本上没有间断；到1992年发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确定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体制的转型已不可逆转。这种不可逆转，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更是因为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心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声誉。从商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资本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产权市场到期货市场，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市场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1985~2002年，中国市场化的总指数从2.183提高到7.061（周业安、赵坚毅，2004）。

2. 政府干预

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投资的规模，是市场秩序的确立者和维护者，政府在有意识地利用各种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杠杆，调控着宏观经济运行，还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司法、银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最终担保者。在处理纷杂的国际关系、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统一全国的社会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调控的力量，实际上一贯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企业、村落和家庭。

政府的独特作用还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由于财政的分灶吃饭制度和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实际上具有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做出决策的很大空间，甚至可以在地方政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

发展模式。

3. 社会结构转型

从历史上看,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比政府和市场要久远得多,在没有政府和市场的时候,社会结构就已经在发生这种影响。如果说市场是一只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政府是一只资源配置的看得见的手,那么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在社会转型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很多微观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状态,而这个空白由各种非正式制度填补。这些非正式制度由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所谓地方合作主义、社区自治规则、民间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都是结构转型的资源配置力量的表现形式。结构转型的力量,更重要地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巨大收益,中国较高的结构弹性成为一种“比较优势”。

4. 全球化

全球化把世界与中国的每一个村落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影响已波及中国的生产、流通、金融、能源以及各种服务业,并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一种特殊力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力量发生重组,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全世界的资源配置,对民族-国家经济政治的独立性也产生挑战。一方面,中国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形成发展为世界一般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利用知识技术的比较优势,试图构建新的世界经济控制体制。中国大规模制造产生的竞争力,使过去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贸易保护武器,现在也开始为那些在此之前一直把“自由经济”强调到意识形态高度的发达国家所使用。

三 中国经验的基本要点

1. 渐进式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

“渐进式”改革,这个早已被人们讨论过无数遍的似乎已经陈旧了的观念,实际上至今仍然在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步骤。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通过试点、“双轨制”和微调进行体制改进、过渡的办法。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试错及时

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到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的全面展开，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扩展和推进，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单位体制、立法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改革都在不断地进行。

渐进式改革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改革的摩擦成本较高，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其间往往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和无序局面。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要求“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一方面政府要求各地服从统一的发展战略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来制定使各地都能够顺利操作的具体方案。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与原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冲突和矛盾，致使政策的落实出现扭曲和变形，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市场发育初期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改革中产生的权钱交易现象、公益部门出现的变相违规收费、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鱼龙混杂情况等等，都是“摩擦成本”较高的表现。

从改革初期到今天，尽管一些国内外的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很多批评，或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改变这种改革方式的时候；但中国从价格的双轨制、投资的双轨制，到通过“下岗”体制向失业体制的并轨，到汇率向浮动制的渐进过渡，“渐进式”至今仍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大概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建立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2. 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苏东转轨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这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

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也基本完成了技术对劳动的大规模替代，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动的瓶颈和整体的刚性；而中国在改革之初，社会结构的弹性依然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运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过去在测算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因素时，除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剩下的一块，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且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主要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的贡献。但最近据专家测算，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中国 1978~1998 年 GDP 增长的贡献就占 20% 以上，要远高于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蔡昉、王美艳，2002）。这种社会结构变动的收益，是苏东国家所无法具有的，它比中国相对于苏东国家具有海外华人投资优势的说法，要更加根本。

另外，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发展的独特性是改革的巨大力度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打破“大锅饭”，拉开收入差距，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引入竞争机制，一方面使中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持续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发展时期未曾遇到的收入差距较大和失业率偏高的问题，而国际上很多学者一直把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的较低失业率和较低收入差距归为“儒家文化的影响”。

3. 社会稳定优先原则和谨慎的民主化探索

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稳步而谨慎地进行民主化探索，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被西方主流社会批评最多的，这种批评一部分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论，更多的则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驱使。按照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民主化是工业化的先导或至少是伴随现象，但对民主化的界定，却是多样化的。“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怎样来源于人民，本来在现实中有丰富的多样性，有各种具体规定的直选和代议形式。现在，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民主越来越等同于多党制、直接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等等，现在又有“街头和广场合法抗议”的新定义。

东亚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快速发展中，也曾受到过来自西方的“非民主”甚至“独裁”的指斥。因为依照西方的标准，几十年

中在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和马哈蒂尔治理下的马来西亚，虽然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并不是民主政治国家，而是东亚“威权”国家。不过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港督治理下的香港，似乎并未被纳入“威权”，因为它符合英国皇室体制的“英国民主”。与此同时，完全移植美国政治法律体制的菲律宾，在“民主体制”下却一直经济不振，社会动荡。

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特定“民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论断，因为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苏东的变化结果而经历着重新审查，这种审查由于“中国经验”而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实践取向是，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判断，不能根据理论的原则，而要基于事实和实践的结果，看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普遍提高。民主的优点是可以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使任何权力都得到监督和制衡，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护；但民主也存在利益协调成本过高、损害运行效率甚至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民主陷阱。

中国在发展中强调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稳定优先”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的探索，期望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政府、企业界、知识界和民众在社会稳定问题上逐步达成的共识，成为中国快速转型中的政治财富。

4. 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实行严格控制，在城市里甚至实行了“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措施。在这一政策的执行中，农村也发生过一些粗暴的过火做法，并因此受到国际上一些舆论的批评。但30多年持续地实行低生育率政策，却使中国避免了可能的人口灾难。中国因这一政策少生了3亿多人，节省了约27万亿美元的抚养费用。外国舆论所说的中国每年“生一个加拿大、死一个葡萄牙、净增一个澳大利亚”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已度过最困难的人口控制阶段。人口的控制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切实收益。比如中国和印度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低于印度；到9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还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但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中国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农村贫困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1978～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6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

比例由 30.7% 下降为 3% 左右。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减贫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因为中国的减贫扭转了世界贫困人口几十年来持续上升的趋势。

不过, 人们较少讨论人口控制政策与减少农村贫困的内在联系, 看不到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 它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人口增长对发展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直到现在, 中国总人口每年仍然净增长 700 多万人, 而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 中国必须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速度, 才能够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中国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 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

5.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注重教育曾被作为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跨越性发展的一条经验, 而对中国来说, 这方面的潜力更大。因为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 使社会总负担系数 (老人和小孩占总人口的比例) 呈下降趋势, 中国目前正处于劳动力供给充足的时代, 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竞争力的空间很大, 这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人口机遇。

中国人注重教育, 有文化传统的因素, 但独生子女的政策, 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教育投资倾向。2000 年以后, 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 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支出之后的第二大消费, 而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 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已成为食品、住房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消费。在近几年的城市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中, 子女教育也被排在包括养老、住房、医疗、就业等选项的第一位。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 1989 年还只有 200 多万, 现在已上升到 2000 多万。中国人的素质教育已经接近了 8 年,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 20 年左右。当然, 就人口总体素质来说, 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距离, 中国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还只有 5%, 而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已达到 30% 以上。

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巨大转变, 人口的关键问题正在逐步从总量问题转向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素质提高的巨大弹性, 以及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使中国具有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知识产出能力的潜力, 从而弥补了中国在发展中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不足, 推动着中国经济强劲增长。

6. 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紧密相连的, 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渐进改革的进

程几乎是同步的。对外开放也呈现出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文化领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到垄断领域的渐进过程。在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外资投入的同时，还采取了“走向世界”步骤，通过海外的投资、兼并、合作、援助，参与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和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不仅在一般技术领域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地区。特别是中国采取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战略，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外交空间。这种国际合作战略，一是把和平、发展、合作视为时代的主题，把经济全球化视为发展的大势，不是拒绝而是因势利导；二是坚持互利合作的务实做法，不使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成为合作的障碍；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参与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体系，对一些普遍价值的争论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四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冷静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长期的和平环境。

四 中国经验中包含的大国发展存在的难题

1. 农民问题对“中国经验”的考验

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后，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尽管政府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这种中国数千年来罕见的坚决措施，但在农民户均耕地规模不足半公顷的约束下，农业劳动比较收益依然过低。现代化国家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但中国经验表明，在因为担心农民因失地而失业和失保、从而无法普遍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情况下，狭小的耕地劳作，包括技术提高支持下的单位面积的增产和增收，可以使农民过上温饱生活，但很难使农民富裕起来和普遍达到社会的中等生活水平。

中国虽然减贫取得巨大成就，但农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目前农村按国际绝对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 1 美元，约折合 2.7 元人民币）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农民的众多，给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特殊的困难，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也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问题。但除了挖掘农业增收潜力、通过普遍兼业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农民走向富裕似乎也别无他途。

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可能要经历比一般现代化过程更长的时间，但这又是